

#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与发展”专题研讨

主持人:王 坤

主持人语: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中国文论;兴辞诗学;中国化;流派创新;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6)03-0012-15

##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朱立元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 一、一个科学的命题

我们正在进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sup>[1]</sup>。如果这个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提法不能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提法更无从谈起,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批评是难以成立的。

据我所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来自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第7部分谈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民族的历史遗产问题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

\* 收稿日期: 2006-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4JZD0034)

作者简介:朱立元(1945-),男,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2]</sup>我认为,这里“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简要而明确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是随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而是有现实的针对性和中国革命紧迫的客观需要。首先,它主要针对当时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是当做教条加以生搬硬套,全然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而惨痛的损失。所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当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客观要求。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因而有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其次,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定位在西方或外来的思想传统范围内,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具体特点相结合,不能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应用和实现,这样才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毛泽东才会同一篇报告中提出相对于外来(包括西方)思想、传统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3](P499)</sup>这句话,在我看来,其中包括了“中国化”的内容(中国的具体特点)和形式(民族形式)这两个主要方面和基本要素,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更加准确而科学的界说。

批评此命题者的理由之一是毛泽东后来放弃了这个提法。确实,毛泽东后来在正式文件中没有再用“中国化”的提法。他的《论新阶段》后来改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这段话也有修改,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笔者不敢妄猜毛泽东为何做此修改,但至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后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全党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时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这实际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各

个领域、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全面、系统地中国化,比之毛泽东的提法又有推进。这说明7年来的抗日战争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虽然没有改变其基本意思,但在表达上述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含义时,却不如“中国化”来得准确和明晰。之所以在全国解放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做这一修改,肯定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特别可能与处理好当时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批评者也承认),或者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站得住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批评者的理由之二,也即“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不科学”。他们认为科学“就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进而理直气壮地责问道:“这样的东西要不要中国化,能不能中国化?平面几何、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需要中国化、能够中国化吗?”我认为,这个责问犯了双重错误:第一,混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指出,这一新的历史观“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sup>[4](P116-117)</sup>。恩格斯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平面几何、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和历史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两者都是科学,都有普遍性,但性质完全不一样: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是针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言的,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与唯物史观无关;而历史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则体现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即使涉及自然界问题,也纳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视野,因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显然,这是与上述批评者混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第二,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来要求、衡量和建设属于历史科学的问题。自然科学既然独立于人类社会,一般说来对于所有民族、国家都是一样的(也有特例,如中、西医学),所以一般不存在民族、国家特色问题,也就不存在“中国化”问题。而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有普

遍规律可寻,但这种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里,是不平衡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有了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里进行不同应用、不同实践的问题,提出“中国化”也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了。所以,批评者的上述责问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外,这篇题为《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文章,在我看来恰恰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sup>[5](P758-759)</sup>。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作风,就是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sup>[6](P667)</sup>。这样一种和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创造性的应用,不正是“中国化”的工作吗?或者说,“中国化”不正是集中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在中国历史和革命实际、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理论应用和理论创造上吗?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进一步证明了他始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确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 二、两个命题的辩证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它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以为又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方向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具体的内容、方式、进度、路径、阶段等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对等照套。

先说第一方面。这里只以五四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时期为例,简要叙述一下这两者基本一

致的发展趋向。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时就起步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都失败了,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7](P1359-1360)</sup>。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期的伟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了长达10年的内战,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曲折和考验,领导和开展了武装革命斗争,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1937年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同时大力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20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起始到逐步深入、历经曲折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说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sup>[7](P1359-1360)</sup>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也沿着上述这个大方向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它同样开始于五四时期,同样是从十月革命后学习苏俄起步的,同样也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从开始到发展、深化阶段也是“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中汲取营养,写出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给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文学艺术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定位。特别是写于1918年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一文,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学与政治一样应当“以俄为师”的主张。而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革命一直到1928年后的“革命文学”之争,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到鲁迅、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等一批左翼作家、理论家,从大量译介苏俄文艺理论到结合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实际阐述、推广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一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光辉典范的诞生,无疑也是在“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曾经对从五四运动、十年内战一直到抗战时期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sup>[6](P658)</sup>。还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文化生力军”以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sup>[6](P662)</sup>。毫无疑问,这里当然包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那个时期也“有了大的发展”。对于国统区内来说,这种大发展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取得了重要进展。我认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一翼和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再说第二方面,上述两者在方向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具体的内容、方式、进度、路径、阶段等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同步,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这在十年内战时期两种反“围剿”斗争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总体上看,十年内战,中国革命是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一则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实施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和政治迫害,二则中共内部先后出现

了几次统治全党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给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提供了可乘之机,迫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进行万里长征,几十万军队抵达陕北时仅剩3万人。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后,这种危难的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与此不同的是,在这10年中,国统区内革命的文化艺术运动却“有了大的发展”,虽然那里的反动力量在“一切文化机关中”占有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却不但没能阻止左翼文化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反而被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艺术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革命文艺呈现出某种“高潮”的迹象和态势。这种情况显然同当时中国革命(军事、政治)处于低潮的总体形势是不同步、不一致、不平衡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和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其中有时两者的进程不完全同步,但总体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离开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总过程来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将之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亦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现代文论的构建过程,其社会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日益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现实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离开了上述总过程和大系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乃至中国现代文论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就都得不到正确合理的理解与说明。

### 三、解决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文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种种实际问题,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不断结合中,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多次作过深刻的论述。他强调指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无目的的,应该“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sup>[6] (P667)</sup>。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有的放矢,就是要“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sup>[8] (P777-778)</sup>。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不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取得某些中国化的表面特色,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革命和现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使之更好地为亿万中国人民所接受和应用,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也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不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仅仅在形式上取得某些中国化的表面特色,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语境中的中国文艺问题。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曲折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进一步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如何更加深入?如何取得更加实质性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应当遵循毛泽东上述“有的放矢”的基本态度和思路,即有目的地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各种文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惟一的正确途径,也是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解决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文艺问题的过程中,能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成为推动这种中国化进程的主要方式。

那么,我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种中国文艺的现实语境呢?我认为,一方面,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自今日始,经过80多年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初步中国化了。与

此同时,中国文艺学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的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即新时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它的异于古典传统之“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我们所立足的当代新文论传统。另一方面,是当前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现状、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现状等)产生和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文艺(或与文艺问题相关的)问题,比如,具体来说,我们拟紧密结合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以下紧迫的“中国”问题:(1)文学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2)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3)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文艺思想问题;(4)人文精神问题;(5)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6)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与中国文艺理论问题;(7)文学的“语言哲学”问题;(8)全球化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9)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与文学、文论的关系问题;(10)“新理性”、“新感性”问题;(11)“性”与当代文学、文论问题;(12)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13)虚拟世界、网络文学问题;(14)加强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交流问题;(15)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包括基本思路、框架结构、逻辑起点、主要范畴、推演理路、叙述方式等)的建构问题,如此等等。

密切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文艺问题,有的放矢,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为之做出科学的回答和创造性的阐释,我认为,这将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向深入、提升到新高度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易杰雄.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2005,(6).
- [2] 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57),1938-11-25.
- [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A].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 [A]. 毛泽东选集 (4卷合订本)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 [6]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A]. 毛泽东选集 (4卷合订本)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 [7]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A]. 毛泽东选集 (4卷合订本)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 [8] 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 [A]. 毛泽东选集 (4卷合订本)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 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之可能性与必要性\*

王岳川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当代文艺在发展中问题不可小看。说得严重一些, 出现了整体意识标准失范, 文学评价找不到一个公正的尺度——主体的尺度不算尺度, 主体间的尺度也不算尺度, 再加上批评的失范, 使人们把“文学批评学”变成了“文学表扬学”, “文学表扬学”走红, 批评失去了风格风骨, 失去了精神的魅力和学术推进的动力。就此而言, 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

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将整个社会分成 3 个资本区域, 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 每个国家都可以用 GDP 量化它。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正在和平崛起。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当时中国的 GDP 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 然而今年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 在几年内中国 GDP 总量将超过日本。换言之, 中国只用了 30 年时间就同日本成为了 1 比 1 的对手。难怪日本在东海油田和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会跟我们摩擦, 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调整好心态, 还不能接受一个庞大经济国度的新崛起。但中国经济资本的崛起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 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 中国的文化资本决非令人乐观, 如文论

的创新几乎成为一个梦。今天在文论边界扩大化问题上的不休争论, 使我们的身份出现了辩认上的危机。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 甚至可以说在长达 20 年内, 中国学者在一个又一个地细读着、消化着、评论着西方文论家, 但是没有出现过整体性地对 20 年以来的中国文论家加以研究的专门著作。

同样, 在象征资本方面中国文论界的问题也极为突出。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 它是个体辩识的根本属性, 是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强国的辩认方式。可惜, 我们今天的象征资本严重匮乏, 因此中国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现象。正因为中国经济日益雄强, 所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在西方看来, 中国缺乏文化对经济发展合法性的重新界定, 缺乏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所以中国文论家今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本学科做出更进一步的清晰的界定, 而在于对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做出界定, 其中, 当然包括对中国文论形象和中国文化身份的界定与创新。

二

在理论创新的谱系上, 有多种不同的道路, 因而有必要考察当代中国文论究竟有无创新的可能性。其问题在于:

第一, 体系创新的哲学思想匮乏。创新体系

\* 收稿日期: 2006-05-01

作者简介: 王岳川 (1955-), 男, 四川安岳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